

挂甲屯的故事

——北京城乡社会变迁研究

包路芳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挂甲屯的故事

——北京城乡社会变迁研究

包路芳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挂甲屯的故事:北京城乡社会变迁研究 / 包路芳著.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00-9589-7

I. ①挂… II. ①包… III. ①城乡一体化—研究—北京市 IV. ①F299.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5164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88390732)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48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00-9589-7

定价: 4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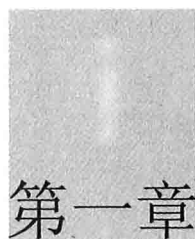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1
一、引子	3
二、相关研究述评	5
(一) 关于追踪研究	5
(二) 近代有关北京的调查研究	11
(三) 李景汉与挂甲屯	21
三、研究的理论框架	28
(一) 社区研究的理论	29
(二) 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	37
四、研究价值、研究框架和设计	49
(一) 研究价值	49
(二) 研究框架和设计	49
五、研究方法的运用	51
 第二章 走进挂甲屯.....	55
一、地理位置与人文坐标	58
二、挂甲屯与海淀	60
三、挂甲屯各地名的由来	63
四、“吴家花园”的飘零	69
 第三章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挂甲屯.....	71
一、皇家庭园与庄园经济	73
二、移民与城郊村庄的发展	75

三、20世纪20年代挂甲屯的生计方式	81
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挂甲屯的小农经济	86
第四章 治理的混乱与大家庭的出现	93
一、保甲制度的变迁	95
(一) 保甲制的复兴	95
(二) 挂甲屯的保甲制	100
二、浮出水面的挂甲屯大家庭	104
(一) 陈家	106
(二) 魏家	111
(三) 许家	113
三、挂甲屯的家庭规模与家庭运转	115
四、乡族关系网络的初步建立	119
第五章 20世纪50~80年代的挂甲屯	123
一、从划分阶级到土地改革	125
(一) 第一阶段：划分阶级成分	125
(二) 第二阶段：土地改革	127
二、合作化运动的开展	130
(一)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	131
(二) 合作社带来的改变	136
三、人民公社的浪潮	140
四、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与个人	146
(一) 分家——大家庭的解体	146
(二) 妇女地位的提升	152
第六章 “有农”时代的终结与“无农”时代的来临	155
一、遭遇城市：“无农”村庄的形成	157
(一)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	158

(二) 第二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	160
(三) 第三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161
二、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修建与“农转非”	163
三、挂甲屯人对“农转非”的心态	166
四、挂甲屯的自主性失业与非正规就业	170
 第七章 “瓦片经济”的效应与社区治理的难题	181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城的扩张	183
二、以租为业: “靠房吃房”	185
三、分户与封院的秘密	189
四、房子与家庭	193
五、孝道的衰落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199
 第八章 挂甲屯的差序格局	207
一、挂甲屯的“首富”与“平民阶层”	209
二、挂甲屯的低保户	211
三、生活在挂甲屯的外乡人	217
(一) 考研村的“游学”情结	217
(二) 消逝的“北漂”艺术家	219
(三) “散蚁”的奋斗	222
(四) 孤独的清洁工	228
四、社区环境的恶化	232
五、分化的社区: “我们”与“他们”	238
 第九章 “内卷化”的社区居委会	249
一、居委会领导班子	251
二、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	258
三、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	264
四、社区志愿者组织与活动	273

五、节点活动与基层维稳功能	278
六、“非典”惊魂	281
第十章 政府与社会：挂甲屯标本下的城市化道路	285
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	287
二、从城郊村到城中村	290
三、何去何从——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探索	294
参考文献	303
索 引	319
后 记	325



第一章

导 论

一、引子

从北京大学西门出来，穿过蔚秀园，再跨过万泉河上的那座桥，从承泽园旁的一条小胡同进去，就是挂甲屯了。曾有好几个朋友问过我是怎么找到挂甲屯的，因为去过那里的人都会觉得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似乎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答案可能要追溯到2005年初，当时的我刚刚安家落户在北五环边上的大有北里小区，东西紧邻圆明园和颐和园，沉浸在当年皇家园林的氛围中，生活安静惬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区家属院围墙外遍布低矮破旧的农民房，周边仍可见到一片片的菜地，卖菜的都是来自外地的流动人口，形成了“都市里的村庄”。从那时起我就深刻体会到了城乡的时空差异，也就是在当年的5月，博士毕业的我来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研究领域也逐渐从“农村”包围“城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城市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5年夏季的一天，当我在闲暇翻阅《中国社会学史》的时候，不经意间读到了李景汉先生1926年在京郊挂甲屯等村庄进行调查研究的介绍。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926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调查方法期间，指导学生在京郊的挂甲屯等四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研究，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留下了宝贵的北京社会变迁标本。而李先生调查的挂甲屯就在北京大学西门，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恰好距离我的住处非常近便。当时家门口只有一趟834路公共汽车，五站地就可到达挂甲屯。读了李先生的书，走进心中再熟悉不过的挂甲屯，面对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都市村庄。挂甲屯已经成为北京五环以内为数不多的还未拆迁的平房区，巴掌大的地方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一溜溜的破旧平房和后建起的简易楼房。如果只是坐着公交车经过挂甲屯，也许你会觉得这儿只是繁华都市的一角，临街连片的小房子，大概都属于违章建筑之列。

穿过挂甲屯还算是得体的外观来到内部，像是步入了一个胡同迷宫，充斥视觉的是狭窄的胡同、封闭的院落，以及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流。疏离的人们似乎也失去了说话的意愿，各自忙于自己艰难的生计。拥挤狭窄的小路充斥着垃圾尘土，水泥地坑坑洼洼，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一阵阵难闻的臭味让人掩鼻而行。电线杆、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出租的小广告，间或有几个小店突然冒出：小超市、饭馆、蔬菜水果摊、理发店、话吧等，一切居民生活所需都可以在这儿得到基本

的满足。放眼看去，可以清晰分辨的新加盖的两层楼房紧紧相邻，纵横交错，有的胡同窄得两个人并排行走都困难。行走在狭窄的小胡同里，因为楼间距离太近没有阳光，会觉得有些阴冷，突然间心头竟会略过一丝丝的紧张、不安甚至是一股难言的恐惧。几个老头老太太正坐在墙角或是家门口打盹、聊天，透过偶尔打开的铁门，可以窥见院子填满了房子，房子又被隔成了众多的小间，家家户户门窗上的防护栏暗示着这里居民的不安宁心境。

在整个屯子里顺着小胡同逛上一圈，用不上半个小时。平房的院落内包括房东住的屋子，一般都没有厕所，整个挂甲屯也只有五个公厕，而所谓的公厕也简陋之极，四五个蹲坑，相互之间没有隔板。要找到公厕并不难，当地人会告诉你出门右转再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有时靠鼻子也能够找到。回想李先生笔下宁静有序的挂甲屯，眼前这一切激发了我要深入解剖这个麻雀、探究这个社区变迁的决心。我对挂甲屯的正式调查，始于2006年春季，2007~2008年又连续追踪调查。我和三位硕士研究生一起在挂甲屯租了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像“北漂”一样生活在这里。通过参与式观察，体会着挂甲屯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随着调查的深入，对挂甲屯的了解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先后发表了几篇与挂甲屯相关的论文，三个学生也各自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对比李景汉先生80年前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剧烈的社会变迁可谓沧海桑田，北京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地处中关村高科技区的挂甲屯，从过去郊外乡村变成寸土寸金之地。城市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使得商业用地不断挤占公共空间，挂甲屯及周边环境的空间局促感日益凸显。昔日村庄的面貌和性质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挂甲屯早已被规划为北京大学的“待征地”，农民基本转居，村庄正在消失。特别是2009年地铁四号线的开通，带动了周边地区快速发展，房价加速上涨。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作为村庄的挂甲屯将被现代都市彻底淹没。

选择挂甲屯作为研究个案，是期待自己能够跨越时空与李景汉先生进行对话，追索和体会李先生当时的所思所想，希望自己能够传承李先生对挂甲屯的人文关怀，延续挂甲屯的学术生命，通过这个昔日的北平郊外的乡村的文化变迁，梳理和描述出北京的巨大变化。近百年来，挂甲屯发生过怎样的故事？社区内的家族、基层政权、居民等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正在经历越来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首都北京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典型城市，正从百年前不足200万人口的

封建帝都，迅速演变为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对于这一剧烈快速的历史性变迁，非常需要一个标本性的研究个案，以生动细致地记录这一历史过程，并深入分析城市化的动力和机制。对挂甲屯的追踪调查，可生动反映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具体过程，对更好地理解和总结中国城乡的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久的将来，挂甲屯会因北京大学的征用而彻底消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值得我们抢救性记录的一个历史标本。

二、相关研究述评

（一）关于追踪研究

社会变迁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的学者都多有涉及。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变化。因此，通过追踪研究的方式研究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人类对自身社会的反思与理解，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制度的改进。追踪调查研究，或称“再研究”，是指研究者或其他研究者在若干年以后回到曾经研究过的地方，再一次对其进行调查研究。自20世纪以来，社会学、人类学的这种追踪研究越来越流行，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很多学者都曾再次返回研究过的社区进行再研究，也有后来的学者对研究点进行的追踪调查。追踪研究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掌握了某一地区相对丰富的原始资料，为再次研究的操作性和可行性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进而成为现代变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1. 西方学者的追踪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社会变迁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再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同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研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的甚至是大相径庭。有研究者的角度不同问题，也有因为社会变迁产生的巨大作用。

追踪研究的经典个案应属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1925年对南太平洋东萨摩亚人的儿童养育模式和青春期行为的研究。她认为“青春期的紊乱

是由于青春期的本质或文明本身引起的，在不同的地方青春期的反应会是不同的”。^①她观察了三个村庄的50名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后，发现萨摩亚人的童年无忧无虑，从青春期向成年的过渡是非常平和的。米德于1928年出版了其民族志的经典之作《萨摩亚人的成年》，她把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同美国人做比较，发现那里不存在一个通常需要经过的“焦躁与不安的时期”，从而得出结论，美国青少年的情感波动是因文化而导致的，而非生物性决定的。

1940年后，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曼（Freeman）不定期地在萨摩亚进行田野调查。在米德去世五年后的1983年，他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资料和对萨摩亚进行的再研究，出版了一本与米德观点针锋相对的书《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他认为米德调查的时间短，且只有一个半月的萨摩亚语言的学习时间，无法做到与当地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也充满紧张和焦虑，与西方人一样在青春期存在着心理紊乱。^②在他看来，米德年轻时在萨摩亚做的极小规模田野工作是不足信赖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对两人截然不同的调查结果曾这样评论：“从比较的方法看，萨摩亚人的性行为并非如米德或弗里曼描绘得那样偏激，在世界上众多文明中，萨摩亚人并不像米德认为的那样的性放纵，也不像弗里曼所认为的那样受限制。当然，萨摩亚人对性行为所持的态度是处于性自由和性压抑的中间状态。弗里曼关于萨摩亚人比其他文化中的人更具保持童贞态度的偏激说法未能得到跨文化研究的支持。”上述讨论在将近60年后的再研究中，掀起了一次激烈的学术讨论，也引发了学术界对追踪研究的关注。

同样，作为追踪研究经典个案的是波兰裔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在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做完田野工作的60年以后，美国人类学家韦娜（Annette B. Weiner）自1971年起五次共一年半的时间回访马氏去过的同一个岛。调查发现也存在差异，马凌诺斯基注意到妇女在岛上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认为是由于母系继嗣社会的谱系作用而形成的，但是他忽视了当地妇女在政治经济学与交换体系中的作用。在马氏描述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中，妇女生活在

① Mead Margaret,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D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28.

② Freeman Derek,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男性的阴影之下，但是韦娜却认为岛上的妇女在这种阴影之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且不容忽视。6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学科的关注点和角度日益丰富，韦娜的再研究正是体现了女性分析的视角。

自20世纪以来，追踪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几乎与李景汉先生在同一时间做社会调查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en Lynd）。1924年，林德夫妇对印第安纳州米德尔敦市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工业化对传统美国城镇的冲击，并于1929年出版了《中镇——美国当代文化研究》（又译《米德尔敦》）成为美国社区研究的经典作品。在这本书中，林德夫妇系统描述了小镇的状况，包括居民的谋生、安家、闲暇、教育方式、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十年以后，夫妻二人对中镇进行回访和追踪调查，于1937年出版了《转变中的中镇》一书。中镇研究留下了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动个案，至今仍是美国社会学家追踪研究的标本，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

1926年，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对墨西哥的特波茨兰村进行了调查，1930年出版了《特波茨兰：一个墨西哥村落》一书。在书中，特波茨兰村人过着祥和的田园生活，社会关系和睦、平静安宁，没有竞争和嫉妒。15年以后的1941年，曾与雷氏共同创建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易斯（Lewis）回访该村，1951年完成了《一个墨西哥村落的生活：重访特波茨兰》。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特波茨兰村是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搅得支离破碎的村庄，部分传统文化趋于崩溃。尽管在这15年间，特波茨兰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二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得出的结论却如此截然不同，令很多学者诧异。按照墨菲（Murphy）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二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田野考察报告都很精确，但受到了各自人格、亚文化、世界观和理论素养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涉及的是围绕各自研究志趣的不同类别的资料。

此外，也有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追踪调查研究。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针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几乎没有可能性。这一时期继续对中国乡村进行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国外从事汉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以我国台湾、香港甚至新加坡的华人社区为调查点，或是凭借以往的调查材料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有幸能在中国本土做调查的西方学者并不多，1956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思（W.R.Geddes）来到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完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对革命前后开弦弓村的社会

变化进行了描述、比较和分析。在他看来,《江村经济》作为知识界的一个里程碑,其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947年,加拿大柯鲁克夫妇(David Crook and Isabel Crook)由英国共产党介绍来到中国,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59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关于太行山区十里店的三部著作,即《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阳邑公社的头几年》,分别记述了河北十里店村的土改、土改复查以及公社化运动,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1959年,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出版了以广州鹭江村(今南景村)调查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由于该书是第一本反映新中国建立前后社会转型的田野调查论著,后来许多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都受到杨先生的影响。1981年,杨先生回国重访了鹭江村。

1966年,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出版了根据他自己20世纪40年代在山西的革命根据地调查为基础写成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改革开放后针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再次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山西长弓村的再调查,出版了《翻身: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等于1975~1978年间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进行了数百次访谈,于1984年出版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情况。1984年,赵文词利用以往调查材料出版了《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研究了陈村的道德权威和政治秩序,他期望通过对这个村落的研究来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轨迹。1992年,他们在跟踪调查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发生的变化后,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进一步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陈村受市场经济影响所发生的变化。以上西方学者的重访,生动地说明了前任研究者的田野素材对于再研究者的意义,再研究具有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视角。

2. 国内学者的追踪研究

西方学者的追踪研究也对国内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我国的社会学起步晚于西方的理论界,后又由于历史原因而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

恢复重建，但是在追踪方面的研究却已有不少经典之作，最著名的应该属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凉山彝家》。老一辈学者们选择一个调查点后，每隔一段时间再去调查研究，探究文化和社会变迁规律，以此反映时代的变迁。

1936年，费孝通先生在赴英国留学前对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后写下了《江村经济》（1939），并以此作荣获了“赫胥黎奖章”，奠定了他在世界和中国的学术地位。1957年，费先生重返江村进行再研究，写下了《三访江村》。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等种种原因，费先生对江村的再研究间断了20多年。1981年后，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重建，费孝通和学生们对江村进行了持续的追踪研究，写下了《江村五十年》。费先生从1957年起20次重访江村，这是中国老一代学者用毕生心血对一个社区所进行的追踪研究，记录了一个村落在近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林耀华先生对四川凉山彝家的追踪调查也颇为瞩目。1943年，林先生对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出版了《凉山彝家》（1947）一书，这是对凉山第一次系统的研究。1975年，林先生二上凉山进行实地调查，发表了《凉山彝家今昔》一文。1984年，林先生带领他的学生第三次来到凉山，写下了《三上凉山》一文，不仅述说了40年来凉山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提出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新课题。1992年，林先生指派他的博士生潘蛟再次前往凉山进行追踪研究，从政权、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等级观念和家计活动等五个方面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变迁进行了考察。最后，将所有的研究成果结集为《凉山彝家的巨变》（1995）。

以上是我国老一代学者中比较著名的追踪研究。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新一代学者秉承老一代学者的传统与思想，不断开拓出新的“田野”，他们是追踪研究的“再行者”。主要代表作有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96）、周大鸣的《凤凰村的变迁》（2006）等。可以看出，庄孔韶先生率先开始对他人田野点的再研究。

林耀华先生曾以自传形式出版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4），这是根据他在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的黄村及其所在县乡镇的生活经历写成的一部小说体著作，以黄村东林一家的家庭兴衰为主线，展现了整个村落社会的各方面的情况。近半个世纪以后，他的学生庄孔韶寻找到林先生笔下的黄村，重新对其进行了再研究，出版了《金翼》的学术续集《银翅——中国的地方

社会与文化变迁》，通过对林耀华笔下的黄村再调查，展现了黄村数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遗产。在《银翅》中，他除了对黄村家庭的变迁进行了研究，更运用了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等方法，对黄村本身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黄村”。《银翅》对汉人社会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H.Kulp）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华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叫凤凰村的地方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乡村的生活》（*Phoenix Village,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一书。他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情况，本书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珍贵资料，对之后的研究者产生了强烈示范作用。70年后，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寻找到凤凰村，在1994~1997年间多次前往凤凰村进行调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凤凰村的变迁》。周教授延续了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并重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对葛学溥提出的“家庭主义”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反思。

美国学者波特夫妇（S. H. Potter and J.M. Potter）曾在1979~1985年间在广东茶山镇做调查，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演化历程与运行机制，199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作为中国社会一个缩影的“茶山意象”。覃德清1997年重访茶山镇，试图努力实现1985年以来的续接，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就波特夫妇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做出回应，引发了“文本制作”与“现实真实”的一些思考。

在回顾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农村调查时，“满铁”在华北诸多村庄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不容忽视。虽然其调查目的是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却积累了大量详尽的田野调查材料，为之后的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乡村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一个中国乡村研究的“满铁传统”。兰林友以“满铁”调查涉及的山东后夏寨作为追踪调查的地点，从社会结构、文化变迁、研究方法等角度对华北村落进行个案研究，完成专著《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2007），主要探讨村落性质、亲属结构、村落政治、民族志方法论等主题，用“同姓不同宗”的本土简介与以“满铁”做研究的黄宗智和杜赞奇进行了跨学科的学术对话。